

文昌东郊桃李村水尾圣娘庙。
邢若摄



近代以来,海南走出不少教育家、学者、侨领和社会活动家。然而,在海南近代文化史上,还有一位学者长期鲜为人知。他没有留下鸿篇巨制,却较早把目光投向海南民间信仰、神话传说、民歌和民间故事,为今天研究海南民俗文化留下了一批珍贵的第一手资料。

他名叫黄有琚,海南文昌人,是近代较早运用现代民俗学方法研究海南民俗文化的学者。

打捞乡土遗落的记忆

近代海南民俗研究者黄有琚

走上民俗研究之路

现存资料显示,黄有琚1933年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。后来,旅居南越的他因毕业证书遗失,曾申请补发毕业证明。这不仅再次确认了他的学历,也为我们留下了他当时旅居南越的重要线索。

目前所见资料中,黄有琚先后发表《水尾婆与文昌从前的“社会”》《雷公的形像》《一位平民的行吟女诗人——嫫月的口传诗》《文昌民歌拾零》《呆丈夫的故事》《家塾的秀才先生》《文昌民间的医药学》等文章,内容涉及民间信仰、神话、民歌、口头文学、民间故事及民间医药等多个方面。

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,中国现代民俗学逐渐兴起。越来越多青年学者开始走出书斋,把目光投向民间,神话、传说、歌谣、风俗等长期流传于乡土社会的文化内容,也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。

1929年,《民俗》第67期刊载了顾颉刚先生的《泉州民间传说序》,黄有琚整理的文昌民间故事《呆丈夫的故事》《家塾的秀才先生》。当时,顾颉刚正在国立中山大学任教并积极倡导民俗学研究,黄有琚也在该校求学。从时间和学术背景来看,黄有琚关于海南民俗的研究,很可能受到顾颉刚及当时民俗学研究风气的影响。

他希望能把这些长期依靠口耳相传延续下来的乡土文化记录下来,使其由口头传播转化为文字记载,为后人保存一份属于海南民间社会的文化记忆。

“水尾婆”与文昌社会

黄有琚留下的民俗著述中,《水尾婆与文昌从前的“社

会”无疑最具代表性。这也是目前所见资料中,最早发表于学术刊物、专门研究水尾圣娘信俗的文章之一。

近年来,关于水尾圣娘信俗的研究也进一步论及黄有琚这篇文章。琼台师范学院郑翔鹏先生在《海南人南天水尾圣娘信仰研究》一文中指出:“近代百年来最早将水尾圣娘信仰带进学术领域的是黄有琚于1929年在《民俗》周刊发表的《水尾婆与文昌从前的“社会”》一文。”认为该文“对于了解当代的水尾圣娘信仰情形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”。

据了解,水尾圣娘信俗起源于文昌,后逐渐传播至海南各地,并随着海南移民远播东南亚,成为海南最具代表性的地方信俗之一。围绕水尾圣娘形成了大量民间传说,如点化渔民潘敏理知恩图报、梦中启示张岳崧等故事,反映出这一信俗早已深深融入海南民众的日常生活。

不过,黄有琚并没有把文章写成一篇介绍神话传说的作品。从《水尾婆与文昌从前的“社会”》这一题目不难看出,其中的“社会”二字,正是全文的点睛之笔。黄有琚真正关心的,并不是水尾婆神话本身,而是希望透过这一地方信俗,观察文昌传统社会的文化面貌。

文章中,他不仅介绍了水尾婆信俗的形成与流传,还详细记述了祭祀活动、军坡习俗等内容,试图说明一项地方信俗如何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乡村社会。这种写法,与传统地方掌故或神异传说已有明显不同,更接近近代民俗学观察地方社会的方法。

值得注意的是,黄有琚并未简单将水尾婆信俗视为“迷信”,而是引用顾颉刚关于朝山进香的论述:“朝山进香,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,决不是可以用迷信二字一笔抹煞

的。”借此说明,民间信俗是理解地方社会和民众生活的重要材料,应当以客观的态度加以考察。

黄有琚还引用容肇祖先生关于妙峰山进香的研究,将文昌水尾婆信俗置于当时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展背景下进行讨论。

容肇祖是我国著名民俗学家。1925年,他曾参与北京大学组织的妙峰山进香调查,被认为开创了中国现代民俗调查的先河。

黄有琚还特别说明,希望以“真诚的客观态度”介绍地方民俗,供研究者参考;对于未经亲自调查的内容,则坦言“不敢凭空捏造”。文末,他又希望读者能够对文中提出的问题继续研究、批评指正,以达到“抛砖引玉”的目的,获得更多关于文昌民俗的调查与记录。这种尊重调查、鼓励讨论、强调客观记录的治学态度,不仅体现了近代民俗学的研究精神,也使得《水尾婆与文昌从前的“社会”》成为研究海南民间信俗和传统社会的重要文献。

记录海南乡土文化

如果说《水尾婆与文昌从前的“社会”》记录的是海南的民间信仰,那么黄有琚的另一批文章,则把目光投向了海南丰富的口头文学和乡土文化。

其中,《一位平民的行吟女诗人——嫫月的口传诗》尤具特色。嫫月并非见于史籍的文人,而是一位生活于民间、作品长期依靠口耳相传保存下来的女诗人。黄有琚不仅记录了她的生平传说,还整理了她的部分诗作,使这些原本散落于民间的口头文学进入现代学术刊物,为研究海南民间文学留下了珍贵资料。

黄有琚还发表了《文昌民歌拾零》《琼崖歌谣二首》等与海南民谣相关的作品,为研究海南民歌和民间文学留下了珍贵资料。

此外,黄有琚还整理发表了《呆丈夫的故事》《家塾的秀才先生》等民间故事,以及《雷公的形像》等文章。这些作品虽然篇幅不长,却保存了二十世纪初海南乡间广泛流传的神话、故事和民间传说,为今天了解近代海南民间文化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。这些文章题材虽各不相同,却都源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。

从水尾婆信俗到文昌民歌,从嫫月口传诗到乡间故事,黄有琚始终关注普通百姓创造并世代流传的乡土文化。今天看来,这些散见于民国刊物中的文字,不仅保存了一批珍贵的民俗资料,也记录了近百年前海南乡村社会,特别是文昌地区的文化面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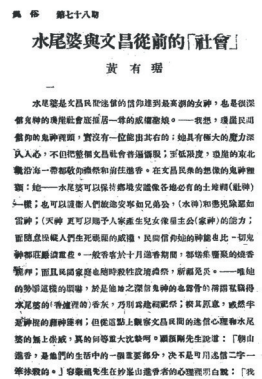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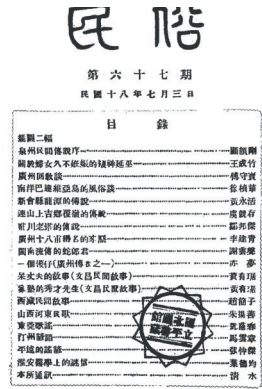
留存于旧刊中的文化记忆

除了民俗研究之外,黄有琚还关注文化理论问题,曾在《现代史学》发表《评朱谦之的文化哲学》《珠江流域文化与中国民族复

兴》等文章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,广东文化界围绕岭南文化、中国文化及民族文化建设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,《现代史学》便是当时重要的学术刊物之一,也是广东文化界交流思想、探讨文化问题的重要平台。黄有琚能够在该刊发表多篇文章,说明他的学术兴趣并不限于地方民俗,而是开始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文化领域。

毕业后,他又与黄允平共同编辑《珊瑚月刊》,并为创刊号撰写发刊词《写在前面》。《珊瑚月刊》还刊载了他所作《烈妇符氏墓志铭》,这是黄有琚采用文言文写成的作品。

《烈妇符氏墓志铭》中称黄得范为族兄,而现有资料显示,黄得范是文昌文教镇龙塔村人,曾任国立中山大学助教、文昌中学校长。这一记载,也为进一步考证黄有琚的家族背景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。



1929年《民俗》周刊第67期目录。内有黄有琚文章《呆丈夫的故事》《家塾的秀才先生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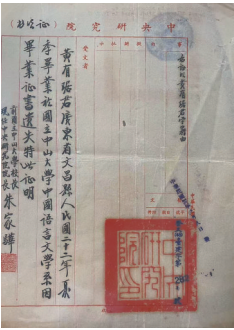
黄有琚1929年在《民俗》周刊第68期发表的《水尾婆与文昌从前的“社会”》一文首页。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云惟耀提供

由于史料零散,黄有琚后来的经历已难完整勾勒。今天,人们能够了解黄有琚的生平与学术活动,主要仍依赖散见于民国刊物中的一篇篇文章,以及保存至今的毕业证明等档案。

黄有琚留下的这些文字,记录的不只是民俗,更是近百年前海南普通百姓的生活与精神世界。透过这些文字,今人依然能窥见近百年前海南民间社会的真实面貌。☐

(本文写作参考了《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周刊》《现代史学》《珊瑚月刊》等资料)



黄有琚后来申请补办的中山大学毕业证明。张鸿 供图